李月兰：双城记 ——《望海潮》《扬州慢》中的两宋城市风貌及变迁缘由探究

词这一文体的繁盛与城市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望海潮》《扬州慢》两首慢词均以城市为表现对象，呈现了杭州与扬州两座城市兴衰迥异的风貌，借以抒发词人颂升平、伤离乱的不同情感态度。

如果要分别从词中摘取一词来概括北宋真宗年间的杭州城与南宋孝宗年间的扬州城的风貌的话，我想没有比“繁华”与“空城”二词更合适的。杭州与扬州都是古代的富庶之地，为何到了两宋会有如此迥异的城市风貌？造成扬州“空城”的原因，南宋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记录了一段传说：“此词（《望海潮》）流播，金主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 城市风貌变迁背后是两宋国运的变化，国运变化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除了这样的传言猜测，我们又是否可以从亲历二城风貌的当事者笔下实际探究一二呢？

巧合的是，两词除了创作者外，均有另外一位阅读者，分别是柳永意图投赠干谒的两浙转运使孙何与阅后有黍离之悲的千岩老人。歌诗合为事而作，当我们跳脱于词人创作的个人意图，以孙何与千岩老人的旁观视角看待两座城市，可能会更有真实感与代入感。

在《望海潮》中，杭州有着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社会条件，也正因其“东南形胜，三吴都会”，才会有“钱塘自古繁华”的社会经济。其实，金兵入侵前的扬州也配得上“自古繁华”四字。《扬州慢》中所介绍的“淮左名都”总写扬州的历史地位，“竹西佳处”又写出了扬州的文化地位，扬州因大运河而成为南北交通枢纽，商贾往来，文人荟萃，唐代便有“扬一益二”的说法，可见其繁华程度本应与杭州不逞多让。

然而，现实中的两城却差之千里。在《望海潮》中，秀美的西湖、壮阔的钱塘江是杭州的美景名片，在这里，生活着参差十万人家，人民安居乐业，物质生活富裕——“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精神生活富足——“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因此，主政官员便也可以放松地享受宴酣之乐与山水之乐——“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而《扬州慢》中，曾经繁华到让才子杜牧写下“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的扬州，现已“尽荠麦青青”。荠麦弥望，四顾萧条，曾经的繁华都已成过眼烟云，废池乔木诉说着城破的悲哀，二十四桥见证着历史的兴衰，桥边红药在战乱的鲜血中兀自盛放，道是无情。“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这座名城如今在黄昏笼罩下，在清越号角中，空空荡荡，既没有人来人往的百姓，连遭到敌军重创后守城的士兵也无。对比何其鲜明！

曾经的杭州变成了如今的扬州，那是否有一天，如今的杭州也会变成如今的扬州呢？哀之更要鉴之，除却金兵南侵的外部因素，这个看似太平的国家内部实际早已危机四伏。身处历史现场的当事者无心，我们却可以从中发现一丝端倪。

《望海潮》一词反映了北宋中期世道太平、市井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的社会风貌，繁华背后，我们也可以看出“竞豪奢”的奢侈之风在社会盛行。奇珍异宝在市场上罗列，绫罗绸缎成为了每家每户的日常布料，柳永虽有夸张之嫌，但所反映出的宋人富丽奢侈之风绝非虚言。之所以“列”出、“盈”满，是因为有“竞”心，百姓对于物质的欲求似乎没有满足的时刻。在生活富足之后，北宋百姓想的不是力图让这个国家更加强大，而是沉迷在歌舞升平的享乐之中。“弄晴”“泛夜”不分昼夜，“钓叟”“莲娃”无论男女老少，可见宋人普遍性的不思进取。从官员角度来看，据考，柳永欲干谒的这位两浙转运使孙何，在历史上也算一位名臣，建言献策，改革人事制度，颇有作为。《宋史·孙何传》记载，孙何在两浙任职期间，“乐名教，勤接士类，后进之有词艺者，必为称扬。”这也是柳永干谒他的原因之一。然而这样一位能臣，出行也免不了“千骑拥高牙”的浩大声势，须知声势的背后是劳民伤财的现实。他自得于自己治下的安宁和乐，“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陶醉于声色犬马之中，却不知危险已然逼近。或者说，承平日久、不思进取、安于享乐的官民正是这个王朝最大的隐患。

大宋王朝因承平日久而“竞豪奢”，“竞豪奢”而致“胡马窥江”的惨痛教训，“竞豪奢”而养成了“犹厌言兵”的畏怯苟安心理，从而形成了国力衰退的恶性循环。一百多年后，北宋早已覆灭，扬州作为南宋与金国相拒的前线，是辛弃疾笔下的“烽火扬州路”。然而，宋人的不思进取之心并未被烽火吓退，甚至已然麻木，只愿偷得一时之享乐而忘却扬州生灵的啼哭。“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一句，写金兵威胁未除，而朝廷却只图苟安，以空城防边。这样的“空城”不是金兵之祸，反是“犹厌言兵”的宋人自取所得。

两词关于城市的不同书写和记忆互相印照，于细微处见知著，记录下了宋人城市生活的安宁自得，也暗示了宋朝覆灭的内部原因。“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